

德裔美國漢學家夏德學術述論

Friedrich Hirth and His Achievements in Sinolo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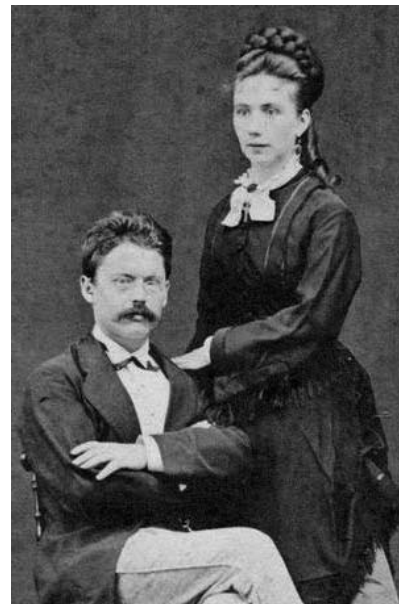
程龍 (Cheng Long) *

夏德 (Friedrich Hirth, 1845-1927) 是近代著名的德裔美國漢學家，他 1870 年來中國，供職於英國人赫德 (Robert Hart, 1835-1911) 掌控下的中國海關，到 1895 年最終返回德國，他在華累計生活了 21 年。夏德是一位典型的學者型官員，在從事海關工作之餘，他不但很好地掌握了漢語，還潛心研究中國歷史、中外關係史以及中國藝術。他一生中用英文和德文撰寫過許多學術著作，在早期中西關係史、匈奴史、先秦史、藝術史和近代漢語等多個領域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1902 年，夏德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邀請赴美任教，講授中國歷史和中外關係史，在長達 15 年的時間裏，他一直擔任該校中文系主任。夏德被譽為影響美國漢學界三位最重要的德國人之一，¹ 德國漢學界曾評價夏德是晚清漢學家中國「發展最快、水平最高的一位」。²

國內學術界對夏德的瞭解始於 20 世紀 30 年代。1930 年，姚從吾介紹了夏德關於匈奴史的研究 (伏爾加河的匈人與匈奴)；³ 1990 年，林幹重述了夏德此文在匈奴史研究中的重要意義，⁴ 但這些成果均未能將夏德其他

匈奴史著述納入研究視野，其對夏德匈奴史成就的評價也因此未能詳盡。

中國學者對於夏德學術成就最為熟悉的部分莫過於 1964 年朱傑勤翻譯的《大秦國全錄》，⁵ 這部夏德最著名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漢學界的權威地位。此外，林英〈20 世紀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綜述〉⁶ 涉及到夏



夏德及其夫人
(圖片引自 <http://openlibrary.org/>)

德對早期中西關係史中「拂菻」問題的考證，馮承鈞、顧鈞則介紹了夏德與柔克義合譯《諸藩志》的情況。⁷

* 作者現為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副教授。

- 1 賀昌群，〈悼弗洛爾氏〉，《圖書季刊》2.1 (1935) : 43。該文收入《賀昌群文集》第3卷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549-555。
- 2 Eduard Erkes, "Friedrich Hirth," *Artibus Asiae*, Vol. 2, No. 3(1927), pp. 218-221. 該德文文獻由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碩士研究生德國人馬永明 (Matthias Brosawer) 協助翻譯整理，在此表示感謝。
- 3 姚從吾，〈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國學季刊》2.3 (1930) : 437。
- 4 林幹，〈外國學者研究匈人和匈奴述評〉(上、下)，《內蒙古大學學報 (社科版)》1989.4: 30-34、1990.1: 21-29。
- 5 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 6 林英，〈20 世紀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綜述〉，《世界歷史》2006.5: 118-125。
- 7 馮承鈞，《諸藩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序言，頁 1-3；顧鈞，〈《諸藩志》譯注：一項跨國工程〉，《書屋》2010.2: 27-29。

除上述成果外，夏德在先秦史、藝術史和近代漢語方面的學術成就尚未有人論及，甚至某些專門介紹德國漢學的著述也未能給予夏德足夠的關注，關於他的情況往往只有數百字的概括性介紹，有的甚至僅在注釋中提到夏德。鑒於國內學術界尚未有專文全面論述夏德的漢學成就，本文利用散見於歐美的各種歷史文獻，擬對夏德的學術成就做一全面梳理，力圖評價其在漢學界及各相關領域應有的地位，以復原夏德漢學成就的原貌。

一、夏德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夏德 1845 年 4 月 16 日出生於德國圖林根州哥達鎮 (Gotha) 的一個律師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一位法國移民，在法國大革命時死裏逃生來到德國。青年時代的夏德曾在歌達學院接受最基礎的拉丁文教育，並在科學方法論大師利特什爾 (F. Ritschl) 和荷普 (M. Haupt) 的指導下學習語言學和古典哲學。

在 1870 年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後，他被派往廣州，任職於廣東海關。1875 年，他轉至廈門工作，兩年後，升任廈門海關稅務司。當年年底，他又調至上海，直到 1888 年返回德國前，他一直擔任上海海關稅務司統計部主任。

1890 年，結束兩年休假的夏德再次來到中國，先後在臺灣淡水、晉江、宜昌和重慶等地擔任海關專員。夏德在中國任職期間，致力於從事漢學研究，是當時著名漢學研究團體「英國皇家亞洲文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中比較積極的會員。1886 年，他繼英國漢學家翟理斯 (Herbert Giles) 之後出任皇家亞洲文會會長，並主持編輯《皇家亞洲文會北中國支會會報》。除了母語德語外，他精通中、英、法、希臘、拉丁、突厥等多種語言文字。1895 年他再次得到休假的機會返回慕尼黑並未再回到中國。⁸

返回德國後，他希望在柏林大學謀求教職卻未能如願。1902 年他受邀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文系工作，主要致力於中國歷史和中外關係史的研究和教學。1904 年，溥倫代表清政府參加美國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路過紐約時，夏德作為美國漢學家代表參加了歡迎活動，他還特別邀請溥倫到家中參觀了其多達 6,000 餘冊的中文藏書。⁹ 夏德還曾作為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指導成員參加過胡適的論文口試。

1917 年，夏德辭去教職返回德國，由於各種研究手稿隨托運的行李在歸途中丟失，他的心情備受打擊，在生命的最後十年間，他幾乎停止了任何研究活動。1927 年 1 月 10 日，82 歲的夏德在慕尼黑去世。

二、大秦、拂菻問題研究

中國歷史文獻關於早期中西交往的記載中時常提到的一個地方就是「大秦」，法國漢學家德經 (De Guignes) 以及德國旅行家、地理和地質學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都認定大秦是以羅馬為首都的羅馬帝國全境。一些西方學者根據 1625 年西安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碑》判斷敘利亞才是真正的大秦。但由於當時一些歐洲漢學家特別是法國漢學大師儒蓮 (St. Julien) 等均認為景教碑係偽作，儘管當時承認此碑真實性的學者更多，但這種質疑畢竟使依據此碑的各種研究缺乏說服力。夏德則另闢蹊徑，他從常見的中國歷史文獻入手來研究這個問題，「從景教碑以外，從中國古代及中古的史籍文獻中，搜集證據，以證明大秦即敘利亞。」¹⁰

1885 年夏德出版了《中國與東羅馬：對中國歷史文獻中關於古代和中世紀兩國關係記載的研究》(*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這本也被

8 關於夏德離開中國的時間，李雪濤《日爾曼學術譜系中的漢學——德國漢學之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頁 41) 稱「1897 年夏德辭職回國」。實際情況是，夏德在 1895 年離開中國，但當時並未辭去海關職位，僅以休假的名義回到德國。1897 年，兩年的休假結束，夏德卻在即將重返中國時正式辭去海關任職。

9 “Prince Pu Walked Up Three Harlem Flights,” *New York Times*, June 2nd, 1904.

10 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頁 3。

稱作《大秦國全錄》的著作一舉「奠定了夏德在漢學界的聲譽」。¹¹ 夏德在書中明確指出：「我斷定大秦古國，中古時代稱為拂菻的，並非是以羅馬為首都的羅馬帝國，而僅是它的東部，即敘利亞、埃及和小亞細亞；而且首先是指敘利亞。」¹²

夏德在書中所使用的中文歷史文獻主要包括《史記·大宛列傳》、《後漢書·西域傳》、《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三國志·魏略》、《新唐書》、《舊唐書》、《大秦景教流行碑》、《文獻通考·外國列傳》和《諸藩志》等。夏德很熟悉西方歷史和地理，並將上述中文文獻中大秦和拂菻的方位、道里、海港、都城、風俗等情況來與西方的歷史記載相互比照，從而得出了超越傳統的結論。

夏德對「拂菻」的關注可以看做其「大秦」研究的延續。在《大秦國全錄》中，夏德指出，拂菻即中古時代的大秦，這個名字是通過唐代的景教傳教士傳入中國的，他將拂菻確定為耶穌的誕生地伯利恆。1909年，夏德在《美國東方學會會報》上發表〈拂菻之謎〉，¹³ 進一步完善了上述觀點。

夏德的著作開創了拂菻研究的新局面，至少從兩個方面影響了未來的研究方向：「首先，拂菻就是中古的大秦，有關拂菻和大秦的記載都是指羅馬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的東方領土，二者應該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其次，新舊唐書中關於拂菻的記載同入華景教傳教士有關。此後，西方學者們對拂菻問題的興趣也日益濃厚。」¹⁴

三、匈奴史研究

夏德作出卓越貢獻的另一個學術領域是關於匈奴史的研究。最早向中國學術界介紹夏德匈奴史研究的是留

學柏林大學、曾翻譯《蒙古秘史》的姚從吾，他在1930年《國學季刊》上發表〈歐洲學者對於匈奴的研究〉，介紹了夏德〈伏爾加河的匈人與匈奴〉一文。當代匈奴史研究專家林幹在〈外國學者研究匈人和匈奴述評〉一文中也重述了對該文的介紹。夏德對匈奴史的研究承襲了他本人漢學研究的特點，即將中國歷史文獻與西方歷史文獻結合起來，對比研究，從而解決了一些學術界的重大問題。

法國漢學家德經（De Guignes）曾注意到西方歷史文獻中有關於「匈人」（Hunnen）的記載，聯繫到中國歷史文獻中的「匈奴」（The Huns），他斷言西方的「匈人」就是中國的「匈奴」。這一大膽的假設將東西方的歷史記載聯繫起來，然而，德經沒有對這一假設提出任何論據，這招致了一些歐洲漢學家的詬病。《紐約時報》曾評價說，「儘管幾代人一直猜測阿提拉王的遊牧部落與建立強大遊牧政權的中國北方鄰居匈奴是同一民族，但是當這一觀點最初出現在法人德經著名的《匈奴史》（*Histoire de Huns*）中時，還是受到了包括克拉普洛特（Heinrich Klapproth）在內的權威大家的嘲笑」，¹⁵ 而實證這一命題的任務最終還是落在了夏德身上。

1899年，夏德在慕尼黑皇家科學院宣讀了一篇題為〈伏爾加河的匈人和匈奴〉（*Wolga-Hunnen and Hiung Nu*）的文章，他考證了《魏書·西域傳》等文獻，認為中國歷史文獻中匈奴之一部「奄蔡」就是後來西方文獻中的匈人「阿蘭」，由此，中西文獻之間關於匈奴或匈人的記載可以建立起對應關係。夏德從中國文獻入手，敏銳地觸及到其中的關鍵問題，其關於奄蔡、阿蘭的討論成為日後匈奴史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並一直影響後來的中外學者在這一領域不斷深入研究。例如中國學者林幹、余太山、洪濤等都就這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¹⁶

11 Edward Heyn, "Professor of Chinese," *New York Times*, Aug. 23rd, 1902.

12 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自序〉，頁2。

13 Friedrich Hirth, "The Mystery of Fu-L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0, No. 1, (Dec. 1909): 1-31.

14 林英，〈20世紀中國與拜占庭帝國關係研究綜述〉，《世界歷史》2006.5: 118。

15 Edward Heyn, "Professor of Chinese," *New York Times*, Aug. 23rd, 1902.

16 林幹，《匈奴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余太山，〈奄蔡、阿蘭考〉，《西北民族研究》1988.1: 102-144；洪濤，〈關於奄蔡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91.5: 25-28。

夏德還發表了多篇關於匈奴史的論述，不斷改進和完善他的觀點，但這些論述多不為中國學術界所知，這裏有必要做一簡要介紹。1901年夏德向布達佩斯匈牙利科學院提交了論文〈論匈人與中國人的關係〉，¹⁷ 隨後又在《聖彼得堡科學院公報》上發表了〈阿提拉家族的起源〉¹⁸ 一文。1909年，已經在美國任教的夏德與另一位東方學家金斯米爾就匈奴史問題展開了激烈論戰，夏德在《美國東方協會會報》上發表了他最後一篇匈奴史著述〈金斯米爾先生與匈奴〉，¹⁹ 對自己匈奴史研究中的核心問題做了最後的總結和修正。

在上述研究中，夏德對自己先前的某些具體結論進行了批判。例如，夏德在〈伏爾加河的匈人和匈奴〉一文中對《史記·大宛列傳》「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這一文獻進行過研究。夏德指出，這個「大澤」可能是黑海。但在〈金斯米爾先生與匈奴〉一文中，夏德做了修改，他認為「既然這個大澤的第一次出現可以追溯到《史記》中與奄蔡相關的記錄，我們就應該在奄蔡的原居地即亞速海（Sea of Azof）和高加索地區之間來確定這個大湖的位置」，²⁰ 因此，這個大澤很有可能是亞速海。比起黑海，亞速海的位置和範圍更加精確和具體。

除了對一些具體結論進行修正之外，夏德後續幾篇研究還提出了一個匈奴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在當時的西方漢學界，流行著一種語言學研究方法，即不需要深入研究中文歷史文獻，而僅憑古今或中外語言中地名發音的相似來做結論，判斷歷史上的地理關係，夏德對此頗為不滿。他指出「在識別古代中國文獻關於外國的

敘述時，我們首先要努力確認歷史事實，而只有在建立事實之後，對於名稱的語言學解釋才會被看做是額外的證據」，有些學者恰恰相反，「陷入追求語源的狂熱中，一旦他的注意力集中於他認為相似的發音時，一些可能警告他走錯了路的中國古代學者的論述都被拋到九霄雲外。」²¹ 據此，夏德認為，在研究匈奴史過程中如果遇到古今地名或用不同語言記載的地名時，應該採用如下的態度：「一個地方的名字，應該是留在最後考慮的事。在我們根據地方的特色把地點考定以後，如果字源上和中文名稱相符，這種額外證據的幫助，我們當然歡迎；但是我們必須小心，不可在考證基本事實以前，便一躍而前，提出語音的結論。」²² 夏德把這種方法貫徹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從不依靠相近的發音而輕易下結論。

經過夏德的論證，德經關於「西方的匈人即中國匈奴」的假設得到了證實，朱傑勤評價說：「前此有許多學者懷疑德基涅（即德經）專憑臆說、不重證據的缺陷，經過夏德可以說已經補足。」²³

四、先秦史研究

夏德在轉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後，因為教學的緣故開始關注先秦歷史。1908年他出版了根據講稿改編而成的《中國古代史》（*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正如該書副標題所顯示的，這是一部從上古到周代末期的歷史，也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先秦史。夏德認為先秦歷史在中國歷史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國人與古代歷史的關係是如此緊密，世界上

17 Friedrich Hirth, "Hunnenforschungen," *Revue Oriental pour les études Ouralo-Altaique*, Vol. ii, 1901: 81-91. 林幹, 〈外國學者研究匈人和匈奴述評(下)〉中稱:「1901-1926年,夏德又發表了《論匈人與中國人的關係》,其注解中稱:「夏氏之文,載於匈牙利出版的《東方評論》第11卷」。從法文期刊名來看,此期刊是《關於烏拉爾·阿勒泰研究的東方雜誌》。另外,林文中「第11卷」係「第2卷」之誤,蓋期刊編號以羅馬數字標注,第2卷「Vol.II」易被看成「Vol.II」。

18 Friedrich Hirth, "Die Ahnentafel Attil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óc,"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St. Pétersbourg*, Fifth Series, Vol. xiii: 220-261.

19 Friedrich Hirth, "Mr. Kingsmill and the Hiung Nu,"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0, No. 1(Dec., 1909): 32-45.

20 *Ibid.*

21 *Ibid.*

22 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頁33。

23 林幹,〈外國學者研究匈人和匈奴述評(下)〉。

再沒有其他人能超越他們。早期歷史，即經典的周代，是所有中國文化的創始階段，其所建立的標準一直影響到我們今天這個時代，且不僅僅限於中國本身，在某種程度上還影響到遠東，尤其是朝鮮和日本。²⁴

《中國古代史》雖然是夏德的一部講稿，嚴格意義上說是一部教科書而不是專著，但這部書中卻包含了許多夏德自己對先秦史的理解。在書中，對於當時西方學術界頗為流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夏德提出了反對。他認為，「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重要宣導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 1844-1894）²⁵ 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能說明中國文化源自於外國的證據，因此「他試圖把人們歸功於黃帝的幾項文化成就當做巴比倫文明的分支是徒勞的」；²⁶ 對於李希霍芬認為新疆東南部的綠洲是中華民族搖籃的觀點，夏德毫不客氣地指出：「從地理學的角度看，這一論斷是可能的、也有些道理。然而，最近的考古發現和文獻證據使上述觀點同樣靠不住。」²⁷ 在對待中國神話和傳說故事的態度上，夏德同意沙畹的看法，認為直到公元前 12 世紀末，中國才有可信的歷史。因此，在《中國古代史》一書中，夏德只用非常少的篇幅來敘述上古的神話傳說。

《中國古代史》的重點部分在周代，全書的後半部幾乎全部是周代歷史。夏德在書中特別強調了外來因素對周代歷史的影響。他指出，諸侯國正是在與匈奴和蠻夷的對外戰爭中拓展了邊疆，同時也利用這樣的契機發展壯大，以此來對抗中央政府。另外，他注意到胡服騎射等文化生活上的外來因素，認為：「從公元前五世紀開始，中國人生活上產生了重要變化，即韃靼化，這一

變化在秦始皇時期仍很盛行。」²⁸ 而這種外來因素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影響最終導致了周代的解體。「孔子的傳統被韃靼、匈奴、斯基泰和突厥元素所取代。這一元素不管你叫它什麼，都是從中亞地區發展而來，並開始影響《周禮》占統治地位的區域。」許多變化疊加在一起「影響了孔子的權威，而儒家文化正是防止周朝完全垮塌的力量。」²⁹ 關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夏德評價：「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中國這樣把學術應用於政府管理並取得如此豐碩的成果。」³⁰

全書還散見著許多精彩的論述，如對各時期文化、中國地理、海航羅盤的興起、土地佔有的理論的論述等等。書中還有關於漢語拼寫和發音的簡單介紹，並附有大量圖片材料、年表、周代地圖和完備的索引。西方學術界這樣評價此書，「夏德教授為學生們提供了一部教科書，為普通讀者提供了一部參考書。這本是一個困難的任務，他卻完成的相當好。」³¹

五、中國藝術史研究

夏德有兩位兄弟，一位是出版商和藝術收藏家，另一位則是畫家。也許是家庭關係的影響，夏德對於藝術收藏和研究也頗為用心，他對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瓷器和繪畫領域。

他的英文著作《古代瓷器：中國中世紀工業與貿易研究》探討了瓷器在中國的發明以及當今歐洲收藏者手中各種瓷器的來源，並從當時中國人的記載中探尋阿拉伯人將著名的青花瓷運往西方各國的商業線路。與其學

24 R. F. Scholz, review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 by Friedrich Hirth,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3, No.3, 1909: 249-251.

25 關於拉克伯里「中國文化西來說」，參見 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 C. to 200 A. D.*, Reprint of the 1894 Edition (Osnabruck: Otto Zeller, 1966)。

26 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p. 14.

27 *Ibid.* p. 18.

28 R. F. Scholz, "Review,"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3, No.3, 1909, pp.249-251.

29 Friedrich Hirth,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the Chou Dynas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p.305.

30 R. F. Scholz, "Review,"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3, No.3, 1909, pp. 249-251.

31 *Ibid.*

術研究相對應，夏德也收藏古代瓷器，主要是青花瓷，他的收藏引起了阿爾弗雷德（Alfred）公爵的注意，公爵本人也是古代瓷器的收藏家和鑒賞家。今天，夏德與公爵的藏品都保存在哥達鎮的 Ducal 博物館。³²

在 19 世紀的最後幾年裏，夏德的學術興趣轉向了中國繪畫。他先後用德文撰寫了《中國藝術的外來影響》（1896）、《中國繪畫書目》（1897）和《中國繪畫的起源》（1900）等一系列研究中國繪畫的著作。而 1905 年刊登在歐洲著名漢學雜誌《通報》上的英文著述《清代畫家雜記》（*Scraps from a Collector's Note Book: Being Notes on Some Chinese Painters of the Present Dynasty*）則是夏德中國繪畫研究的代表性論著。同年，該書的單行本在荷蘭萊頓、德國萊比錫和美國紐約同時出版。這本書也被一些學者翻譯成《收藏家筆記片斷》或《一個收藏家關於清代畫家的雜記》。

夏德之所以要撰寫這部《清代畫家雜記》，一方面源於他自己對清代畫作的收藏和喜愛，另一方面是他力圖扭轉當時西方漢學界對清代繪畫的偏見。在 20 世紀初，西方漢學界公認的關於中國繪畫的權威著作是英國漢學家翟理斯的《中國繪畫藝術史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1905*）。不過，翟理斯只關注中國上古繪畫，而有意輕視清代藝術。其《中國繪畫藝術史導論》所介紹的繪畫大師全部來自明代以前，關於缺省清代畫家的理由，翟理斯認為主要是缺乏材料。他在書中解釋說：「在滿清時代沒有一個關於藝術的權威著作可供參考和引用」，³³ 他還特別指出張庚的《國朝畫徵錄》雖然可以參閱，但其中缺乏藝術批評的成分，並不是令人滿意的文獻材料。由於翟理斯的漢學成就和名氣，他關於清代繪畫不值一提的論斷對歐洲漢學界特別是從事中國藝術研究的學者影響很大。

夏德對此極為不滿，他並不認同翟理斯關於清代缺

少繪畫藝術文獻的觀點以及由此所得出的結論。相反，夏德覺得清代的藝術文獻浩如煙海，他認為：「翟理斯的批評來自於傳統的偏見，但其觀點卻被許多學習藝術的學生所接受。其實，這些學生們很少有機會見到 1644 年以後的畫作。」³⁴ 就在翟理斯出版《中國繪畫藝術史導論》的同一年，夏德推出了《清代畫家雜記》一書，其目的就是「要建議那些藝術研究者在沒有研究清代畫作之前不要被偏見所左右」。³⁵

《清代畫家雜記》是夏德居住在江蘇揚州和福建晉江時，根據自己的收藏和研究經歷所寫下的筆記，也是為西方學者所準備的一本研究清代乃至中國繪畫藝術的入門書和工具書。該書主要介紹了清代 67 位有代表性的畫家。

除了介紹清代畫家之外，夏德還在書後的附錄中列舉了 45 位清代以前的畫家以及 28 位繪畫史論的作者為西方藝術研究者提供參考。從他選取畫家的數量上看，他有意重點突出清代，而對明代及以前的畫家採取了從簡的態度，這樣的編排內容使《清代畫家雜記》成為了與翟理斯《中國繪畫藝術史導論》相抗衡的著作。同時，由於兩本書各有側重，它們幾乎同時成為西方藝術研究者案頭不可或缺的重要參考資料。

六、對晚清書面語的教學與研究

在初到中國的五年間，夏德任職於廣東並開始學習粵方言，但很快就轉而學習官話，並致力於晚清書面語的教學與研究。夏德對晚清書面語的研究和教學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1840 年以後，西方人大量進入中國，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他們發現中國各地方言林立、差別極大，而書面語言則相對統一、各地通用。但絕大多數西方人忽

32 Edward Heyn, "Professor of Chinese," *New York Times*, Aug. 23rd, 1902.

33 Herbert A. Gil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918), p. 170.

34 Friedrich Hirth, *Scraps from a Collector's Note Book: Being Notes on Some Chinese Painters of the Present Dynasty* (New York: G. E. Stechert, 1905), p. 5.

35 *Ibid.* p. 6.

視了漢語書面語在文體上的巨大差別，紛紛以儒家經典作為書面語的學習材料，但很快他們就在實際應用中遇到了難題。儒家經典著作與清末公文的行文風格大相逕庭，其內容也與外交事務以及實際生活毫不相干。以英國駐廣州領事館譯員的密迪樂（Thomas Meadows）和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為代表的西方人較早意識到這一問題並對漢語書面語進行系統分類研究。

1847年，密迪樂在《漫談中國政府與中國人》（*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一書中將晚清公文中所使用的書面語稱為「文件體」（Documentary Style or Business Style）。它有別於上古時期的古文，被廣泛的用於19世紀的「書籍、官方通信以及任何具有公文特點的文獻中」。³⁶ 鑒於其實用性，密迪樂主張外交官們應該主要學習這種書面語。

為了使讀者對西方人所謂的「文件體」書面語有所理解，我在這裏引用一封西方外交官員用「文件體」書面語寫給中國官員的信，這也是後來西方人用來作為「文件體」書面語學習的範文。信中，這位西方外交官主動提出用西醫為中國官員患病的夫人醫治。其全文如下：

昨日聞得令正夫人玉體違和，勢甚沉重，不勝懸系之至，未悉是否願服外國醫藥，如有欲延醫用藥之處，本大臣深可代為效勞。中懷掛念，希即玉復是望。此達，順頌日祉，並候令正夫人金安。³⁷

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學習文件體書面語，威妥瑪編撰了《文件自邇集》，精心選取了148篇「文件體」範文，這是西方人學習晚清書面語的第一部專門教材。然而，威妥瑪雖然在《文件自邇集》中提供了大量「文件體」書面語的範文和部分翻譯，卻並沒有對「文件體」書面語的獨特語法特點和用詞習慣給予說明和解釋，這

給廣大初學漢語的西方外交官帶來了一些的困難。這一工作直到19世紀80年代末，才由德國漢學家夏德完成。

夏德在長期海關工作中認識到「文件體」書面語對於外交官的重要性，成為繼威妥瑪之後研究和推廣「文件體」書面語成就最高的西方學者。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文件體」書面語教學在19世紀80到90年代達到了頂峰。

1888年夏德編著了「文件體」書面語教材《文件字句入門》，這本書用英文寫成，題目為*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該書由上海別發洋行（Kelly & Walsh Ltd.）出版，並同時在香港、橫濱和新加坡刊行。在《文件字句入門》一書中，夏德沿襲了威妥瑪對“Documentary Style”的翻譯，仍用「文件」二字作為書的題目。

夏德對威妥瑪《文件自邇集》的缺陷並不滿意，他積極總結「文件體」書面語特有的語法現象和用詞特點，而這正是威妥瑪沒有完成的工作。他在序言中謙虛地指出，「本書的目的只是在於確立個別的語法規則，而不是建立整個『文件體』的語法系統。當然，其中很多語法規則與其他文體有很密切的聯繫，而另外一些則完全是『文件體』的特點。本書主要討論的正是後者」。³⁸

夏德在書中介紹了34種「文件體」書面語特有的語法現象。例如，他注意到類似現代漢語「把字句」的「將字句」在「文件體」書面語中頻繁出現，他在研究這一語法現象後向學習者提示：「將」字之後、動詞之前的部分才是句子的賓語，並引用《文件自邇集》中的例子「將被拿之人立即釋放矣」，「現將執照帶回本衙門」等來予以說明。³⁹ 夏德關於「文件體」語法的說明既簡潔又準確，是當時駐華外交官們不可多得的漢語學習材料。

由於夏德長期供職中國海關，他將大量精力投入到

36 Thomas Wade & W. Hillier, *Yu-Yen Tzu-Erh Chi: Colloquial Chines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1867), p. xii.

37 Thomas Wade, *Wen-Chien Tzu-Erh Chi: A Series of Papers Selected as Specimens of Documentary Chinese* (London: Trubner & Co, 1867), p. 46.

38 Friedrich Hirth, Introduction to *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Shanghai: Kelly & Welsh Limited, 1888), p. 3.

39 *Ibid.* p. 40.

為海關工作人員講授「文件體」書面語的教學活動中。為此，除了《文件字句入門》外，夏德還編寫了《新關文件錄》和《文件小字典》等一系列針對海關外交人員的「文件體」書面語教材和工具書。現保存在美國加州大學圖書館的兩卷本《新關文件錄》主要為在清代海關工作的外國人處理海關事務提供文案上的幫助和便利，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實用性和專業性。書中的大量範文來自海關工作經常要接觸到的清代公文，包括進出口貨物制度和稅單等各種通關檔。《文件小字典》則是第一部「文件體」書面語工具書，這本漢英字典實際上是為了配合《新關文件錄》的教學而編撰的，收錄了該書所出現的所有生詞和短語，按照韋氏拼音的發音原則排序，查閱起來十分方便。

七、結語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夏德的漢學研究涉獵面非常廣泛，且成績斐然，憑藉這些成就，夏德在晚清漢學界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的學術觀點也為漢學界廣為接受。

夏德關於「大秦、拂菻是羅馬帝國東部即敘利亞」的論斷雖然也引起了一些爭論，但最終被大多數西方漢學家所接受。法國漢學大師伯希和 1915 年在《通報》上發表文章時就採納了夏德的觀點，稱「當紀元一世紀頃，中國人名地中海東部為大秦」⁴⁰ 而沒有把大秦確定為整個羅馬帝國。他雖然對夏德論證過程的中若干細節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認為自夏德以後，「三十年矣，無人提出異議也。」⁴¹ 朱傑勤曾評價夏德關於「大秦、拂菻」的研究「力排眾議，獨抒己見，把幾十年的學術上的懸案，成為定論，使千多年的中國與西方的文

化關係的線索更為突出。」⁴²

夏德的對匈奴史的研究更是貢獻巨大，他把中國文獻中關於匈奴的記載和西方文獻中關於匈人的記述聯繫起來，使匈奴在歐亞大陸上遷徙演變的歷史更加清晰明瞭，匈奴史研究也由此打破區域的界限而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夏德以後，中外治匈奴史者無不放眼歐亞大陸，同時利用中外文獻和考古發現進行相互參照，匈奴史研究從此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夏德對晚清繪畫史的研究第一次在西方漢學界強調了清代繪畫的藝術價值和重要地位，糾正了傳統的錯誤偏見，其對於西方藝術研究者客觀、正確地看待中國繪畫，特別是清代繪畫藝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清代畫家雜記》一書出版後不久，即被歐洲漢學界譽為「歷史上關於中國繪畫最好的著作」。⁴³

而通過一系列「文件體」書面語專著、教材和工具書的編寫工作，夏德開創了晚清「文件體」書面語教學的新局面，他總結了「文件體」的語法規律和用詞特點，補充了大量「文件體」範文，更在中國海關內積極推動「文件體」書面語的教學，從而使「文件體」書面語進一步為廣大在華工作的外國人所認識和接受，極大提高了外交事務的工作效率。

除了上述具體的漢學成果之外，夏德的學術貢獻還在於將傳統歐洲漢學輸入美國，從而推動了 20 世紀美國漢學的發展。賀昌群在 20 世紀 30 年代談到美國漢學向歐洲借鑒學習時認為美國漢學比起「歐洲先進諸國，固不可同日而語。然其間足以為斯學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來惟三人耳」，而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哥倫比亞教授夏德」。⁴⁴

夏德從 25 歲開始便於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此後的半個世紀裏，不論他身在中國、德國還是美國，都

40 伯希和，〈犁軒為埃及亞歷山大城說〉，原載《通報》1915 年。轉引自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頁 34。

41 同上註。

42 夏德著、朱傑勤譯，《大秦國全錄》，譯者說明。

43 Eduard Erkes, "Friedrich Hirth," *Artibus Asiae*, Vol. 2, No. 3(1927): 218-221.

44 賀昌群，〈悼弗洛爾氏〉，《賀昌群文集》第 3 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始終從事與中國相關的事務，並一直把漢學研究作為自己的事業執著地追尋。他的學術著作在西方和中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他本人也因此成為近代西方漢學界一顆耀眼的明星。

夏德漢學著作表：

1. *China and the Roman Orient: Researches into Their Ancient and Medieval Relations as Represented in Old Chinese Records* (《大秦國全錄》). Shanghai, Hongkong: Kelly & Walsh, 1885.
2.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with a Vocabulary, for the Special Use of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新關聞見錄》).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85-1888.
3. *Notes on the Chinese Documentary Style* (《文件字句入門》), Shanghai: Kelly & Welsh Limited, 1888.
4. *Vocabulary of Text Book of Documentary Chinese* (《文件小字典》).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88.
5. *Ancient Porcelain: A Study in Chinese Medieval Industry and Trade* (《中國古代瓷器》). Leipsic & Munich. 1888.
6. *Wolga-Hunnen and Hiung Nu* (《伏爾加河的匈人和匈奴》), 1900.
7. *Chinesischen Studien* (《中國研究》), 1890.
8. *Hunnenforschungen* (《論匈人與中國人的關係》), *Revue Oriental pour les études Ouralo-Altäique*, Vol. ii, 1901.
9. *Über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 (《中國藝術在外國的影響》), 1896.
10. *Über die einheimischen 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alerei* (《中國繪畫書目》), 1897.
11. *Über Entstehung und Ursprungslegenden der Malerei in China* (《中國繪畫的起源》), 1900.
12. *Chinesische Ansichten über Bronzetrommeln* (《中國青銅器》), 1904.
13. *Scraps from a Collector's Note Book: Being Notes on Some Chinese Painters of the Present Dynasty* (《清代畫家雜記》), New York: G. E. Stechert, 1905.
14. *Research in China, Expedition of 1903-04, under the Direction of Bailey Willis. Syllabary of Chinese Sounds* (《中國音韻》). Washington D.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7.
15. *Chinese Metallic Mirrors; with Notes on Some Ancient Specimens of the Musee Guimet* (《中國銅鏡》). Paris. New York: G. E. Stechert, 1907.
16.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To The End of Chou Dynasty* (《中國古代史》).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8.
17. "The Mystery of Fu-Lin" (《弗林之謎》).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0, No. 1, (Dec. 1909): 1-31.
18. "Mr. Kingsmill and the Hiung Nu" (《金斯米爾先生與匈奴》).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30, No. 1(Dec., 1909): 32-45.
19. "Early Chinese Notices of East African Territories." (《關於東非的早期中文文獻》)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30, No.1(Dec. 1909): 46-57
20. *Native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 (《中國繪畫史史料》), New York, 1917.
21. *The Story of Chang K'ien, China's Pioneer in Western Asia: Text and Translation of Chapter 123 of Ssi-Ma Ts'ien's Shi-Ki* (《張騫傳》), 1917.
22.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諸蕃志》), Entitled *Chu-fan-chi*. Edited, tr. from the Chinese and Annotated by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Amsterdam: Oriental Press, 1966.
23. "Die Ahnentafel Attila's nach Johannes von Thuróc" (《阿提拉家族的起源》).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St. Pétersbourg*, Fifth Series, Vol. xiii: 220-261.